

转型国家转型损失原因分析

杨 晓 张玉玲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世界范围内的转型国家在20多年过程中所出现的转型损失为切入点,运用转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探讨了转型国家的转型损失的成因。结果表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典型事实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对于转型国家来说,除了转型过程中政策本身的失误之外,其主因在于制度方面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政府规制能力下降以及社会资本存量严重缺乏。

关键词 转型损失 市场制度 政府规制 转型社会资本

杨 晓,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518060

张玉玲,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830012

一、转型与转型损失

“转型”主要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大多数文献对转型的研究时点约从1990年开始,研究的对象为前苏联及前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国家、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对中国的研究涉及很少,尤其是转型前10年期间(约1990—2000年)。然而,随着中国近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外的转型研究也开始把中国纳入了研究范畴,开始关注其他转型国家与中国转型之间存在的异同,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Turley和Luke(2011)、Marangos(2013)、Woo(2013)。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转型国家的终极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改善、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然而,截至目前,不论是中国,还是前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国家以及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后者,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福利损失。转型国家转型损失典型事实的相关研究,由于时间相对较短,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第一个十年末(即2000年前后)和第二个十年末(即2010年前后)。综合性的研究是Campos和Coricelli(2002)对转型前10年的研究,以及Turley和Luke(2011)对转型前20年的研究。不论是前10年还是前20年,典型事实主要表现为:产出下降、资本缩水、劳动流动性差、失业、收入不平等上升、死亡率上升、入学率下降、腐败和地下经济活跃、政府税收和公共支出下降、制度坍塌、制度真空。而中国转型期间的典型事实与上述国家相比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差异性主要表现为:

中国并未出现其他绝大多数转型国家所出现的转型衰退,而是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寿命以及入学率也在提高、贫困现象在不断的减少。除此差异性之外,还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典型事实,即腐败和地下经济活跃、贫富差距扩大、私人部门的活动活跃、制度的缺失、无序与无效,等等。总的说来,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转型国家,这些所谓的典型事实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转型国家的国民福利水平。

要想降低这些典型事实所造成的福利损失,首先必须了解这些典型事实背后的原因,只有在了解其原因的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的找寻合理的对策,以此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但是,这些转型损失究竟是各个转型国家所特有的因素所致(例如,地理位置、文化、宗教、战争和冲突、转型前的初始条件,等等),还是绝大多数转型国家都存在着的共同因素所致(例如,计划经济制度、集权政治制度,等等)。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仍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在梳理现有的代表性文献基础上,分别从政策、市场制度、政府规制以及社会资本层面来具体总结和分析转型国家损失的原因,以此可为中国的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政策参考。

二、转型理论及其争论

众所周知,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然而,在转型初期,无论是转型国家,还是理论界,对转型理论的准备明显不足,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在突如其来的转型面前,没有合适的理论和政策支撑转型,只能借助先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理论和模式来展开。然而,随着转型20多年(中国30多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关于如何认识转型,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但对转型及其理论基础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在转型理论以及模式研究的学者当中,Turley和Luke(2011)、John Marangons(2003,2013)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和总结。Turley和Luke(2011)把转型模式大致的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模式,即“华盛顿共识”,主要以坚持新古典主流理论与方法论为基础;另一类是非传统模式,即“制度—演化主义”,主要以反新古典理论,诸如后凯恩斯主义、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等为基础。前者在转型过程中主要聚焦于市场政策的改革,主要包括价格和贸易自由化,即“把价格搞对”、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重组和私有化;而后者主要强调的是转型过程中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强调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即“把支撑市场体系的制度搞对”。二者的差异在政策上主要体现在“激进式”与“渐进式”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在两种方法之间存在,而且在主张“华盛顿共识”的内部也同样存在。这一争论在转型初期表现的尤为激烈,主要分歧在于转型的速度与次序,但随着转型过程的深入以及转型初期绝大多数转型国家都出现了所谓的“转型衰退”,经济学家开始把重点转向诸如所有权、竞争、制度以及治理等更基本的问题之上^[1]。转型理论以及模式的总结,大多数学者认同Turley和Luke的描述,进而导致对转型过程损失的解释也多采用上述的理论以及其衍生的政策来进行,即多采用单一的方法进行分析,要么是只针对经济变量,要么是只针对经济制度,忽视了政治体制、初始条件、经济制度的产出质量等因素对转型过程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而John Marangons(2003,2013)却在此方面做出了补充和完善,他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把多种因素纳入了其转型模式的分析中,共分为五类,具体见表1。据表1可知,前两类的转型模式与Turley和Luke(2011)的分类是相一致的,也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模式,第五类则是中国的转型模式。

Marangons的研究表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含了大量相互关联的因素,然而不同的理论以

[1]需要注意的是,重点的转向并不能说明“制度演化”观点不重视改革的速度与次序,而是认为在进行这些改革之前,需要存在其改革的制度基础。

表1 转型模式与理论

转型模式	休克疗法	新古典渐近主义	后凯恩斯主义	多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	非多元化市场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		后凯恩斯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转型速度	激进式改革	渐进式改革			
政治结构					非多元化
意识形态	自利		自利、共同利益	自利、共同利益、 广泛参与	自利、共同利益、 通过党派机制参与
制度结构	市场力量的结果		国家行为的结果		
初始条件	基本无视	有限度考虑	重要	相当重要	

注:内容源于 John Marangos (2003, 2013) 的相关研究。

及模式所强调的因素以及其重要程度也大有差异,这些差异会在转型政策以及转型绩效中得到体现。例如,转型初期一味的强调如何进行市场结构改革,即不论是“激进”,还是“渐进”方式,关注的重点均为价格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化与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忽视了维持市场结构运行的制度,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些制度安排会马上出现并且运行良好,即使需要制度的重新构建也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政府的干预。

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以及转型初期绝大多数国家不良的经济绩效,都促使排斥制度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制度改革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正如EBRD(1999)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教训是,缺乏制度支持的市场将不能良好的运行,即贸易自由以及私人所有权的实现并不能带来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并且这些重要的基础制度的构建和贯彻均需要政府的力量。由此可见,简单来说,目前的转型理论是一个综合体,不仅要强调市场结构构建的重要性,还需要以市场制度为基础来展开,缺一不可,否则会造成巨大的转型成本。因此,本文试图以转型理论的相互争论为主线来分析转型国家的损失,其中重点从制度框架来解释损失背后的原因。

三、转型损失原因分析

转型所引发的福利损失的原因分析,本文重点从制度框架来解释,其主因是不论是完成转型的国家(多数中东欧国家、俄罗斯),还是正在转型的国家(中国、前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国家),以及“原地踏步”的转型国家(中亚国家),制度以及制度质量已经成为制约其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

从计划经济转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借助于合适的战略、策略与政策,因为政策工具的选择会直接影响政策产出。除此之外,政策质量或者产出的好坏还取决于政策工具所适用的具体制度环境。不仅如此,从政策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分析还体现了转型经济学家对于转型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即从转型初期的不受重视(尽管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到转型过程中逐渐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强调(Linn, 2001; Havrylyshyn, 2001, 2006; Kolodko, 1999)。

1. 政策本身的因素

在这场大规模的人为发动的(或者经由主权国家政府主动推动、或者通过政局变化导致政府被迫实施改革政策、或者通过其他自上而下的形式)制度变迁面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体制改革战略、策略与政策。对于转型政策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以“三位一体”政策为主的初始阶段,此阶段很少关注和强调制度改革;以制度和结构改革为主的第二个阶段。

从政策角度来看,初始阶段政策确实造成转型成本(Calvo 和 Coricelli, 1993; Amsden 等, 1994; Kornai, 1994; King, 2003; Berend, 2009),最大的损失是产出的意外下降。其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转型初期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推行的政策均以“三位一体”为基础来展开,即基本上是政策的“一刀切”,没有考虑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基础的

制度安排,以及政策本身的一些缺陷。第二,改革政策争论的焦点在于转型的速度,即“激进”还是“渐进”之争。然而事实证明,所谓速度的争论,用途不大并且具有明显的误导性(Turley 和 Luke, 2011), Kornai(2000)更认为经济学家对于转型速度争论的强调有点过度 and 痴迷。

2. 市场制度及制度质量(制度产出)

在第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制度和法律改革很少受到关注。随着转型的推移,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也开始意识到标准型的政策不能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而带来一系列的转型成本。于是,改革者开始更多的强调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聚焦于市场所需要的多方面的制度安排。本文从市场制度、政府规制、社会资本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市场制度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微观企业,主要通过考察企业的营商环境或者经营障碍来衡量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根据研究结果来看^[1],首先,税率、政治不稳定和腐败是所有的转型国家共同的比较大的障碍。其中,税率(2.2分)这一障碍最明显;政治不稳定(1.9分)次之,因为政治的不稳定会导致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家决策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于这一障碍强调最少的是中亚国家,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亚国家长时期的独裁主义政体的本质。随后是腐败(1.8分),其中 R、CA、SEE、EEC 均认为腐败是其在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严重障碍。除此之外,获得金融支持(1.5分)也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即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仍有 15% 的受访企业认为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其次,从转型国家所在的地理区域以及具体国家来看,不同障碍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腐败在俄罗斯的平均得分为 2.2 分,明显的要高于其他 CEB(1.4 分),而且仅在俄罗斯就有 11.2% 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是经营商业过程中的最大障碍。然而来自非正式部门的竞争在俄罗斯却被认为是相当微小的障碍,但是在其他地区确是主要障碍。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障碍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 1999 年到 2009 年间,有 11 个领域的百分比发生了变化:如关税和贸易管制、司法的运转、税收管理在此期间得到了改善;税率、获得金融支持、腐败虽然在 1999-2002 年之间有很大的下降,但在此之后则没有更多的改善,甚至还有点恶化;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电力)的障碍程度越来越大。

3. 政府及其规制能力

正如诺斯(1981)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所述的那样:“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应该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同样如此,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到目前为止更是没有定论。转型 20 多年来,对于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对其重视程度,与转型初期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并且受到很大的关注。转型初期政府功能主要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来展开的,即在制定价格、控制或者干预生产和分配方面都不应该有政府的存在。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转型国家的领导者,与计划经济相比,似乎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提倡政府的活动最小化、打破政府的制度,其目的是使得市场力量自由的发挥作用。Sachs(1994)也持类似的观点,即只要中央政府退出,市场就会自发的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是波兰 90 年代的产业和贸易部长 Tadeusz Syryjczyk 所认为的那样,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没有政策(Kolodko 和 Nuti, 1999),政策似乎被认为是对市场力量的不恰当的干预。然而,随着转型的深入,以及经济思想的不断演化,反对新自由学派的经

[1]本部分的研究分析主要是基于欧洲复兴银行和世界银行 2008/9 共同承担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 BEEPS)的结果。调查国家的区域分别为: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CEB)、东南欧国家(SEE)、东欧和高加索地区国家(EEC)、俄罗斯(R)、中亚国家(CA)、土耳其(T)此调查主要是评价运行企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的严重程度,用 5 分制来表示不同的严重程度,0 分表示没有障碍,1 分表示微小障碍,2 分表示中等程度的障碍,3 分表示大的障碍,4 分表示非常严重的障碍。

济学家认为,尽管计划存在着许多自由市场所不具备的活力和效率,但是政府的作用还是相当重要的,新自由学派有关政府的观点有些过于简单,甚至会对改革造成误导或者引入歧途(Berglöf等,2010)。他们认为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甚至在最初阶段都不应该只关注政府“足迹”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而是应该关注在经济产出过程中,政府该如何、以及朝着什么方向迈进。Kolodko(1999)认为与政府政策质量相比,政府的大小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Kotz,2000),应该成为一个有效的和可信的政府(Ellman,2012),而不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对于政府来说,其主要目标是实施法律或规则、履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等。因而,总的说来,政府规制能力也就是政府实施规则和管理的效果与质量(Popov,2012),主要取决于技术能力和政府或者国家能力。技术能力主要与信息 and 人力资本有关(Berglöf等,2010),而国家能力主要与政府的收入、法治和民主有很大关系,并且还取决于法治与民主的结合(Popov,2012)。Popov(2012)认为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所引发的转型成本,部分是转型前的客观条件(工业结构和贸易模式的扭曲)所造成,但多数还是转型期间逐渐衰弱的国家制度能力所致。

首先,转型政府规制能力低下表现为政府执行力的下降。转型初期,一味对政府的规模进行限制,税收与支出严重不足导致政府执行力下降。例如,大多数CIS、SEE财政支出下降了50%或者更多,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补偿维持正常制度运转以及提高制度效率所需要的费用。因此政府执行财产、合同权利、抑制地下经济、打击罪犯以及确保法律和秩序的正常运转的能力大幅度下降(Popov,2011),导致了制度的真空,破坏了商业环境,进而导致产量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平衡。

除限制政府规模之外,法治和国家政体(民主或者集权)也会影响着国家的制度能力。根据转型理论与模式中的政治结构来看,转型国家大致可分为多元化和非多元化两类,在转型国家中的具体分类为,强民主政体(如中欧国家)、强集权政体(中国、越南、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弱民主政体(如前苏联国家以及巴尔干半岛国家)。前两类的特点主要是政治上的自由化,可以保护个人财产权、创造法律 and 管理的框架。而后者尽管是民主的,但是政治上不自由,缺少强的制度以及实施法律和管理能力(Zakaria,1997),这一现象又被称为“狭隘的民主”,即一些国家,在法治建立之前,过早的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东欧、东亚国家是首先建立法治基础,其次再逐渐引入民主选举,而拉美、非洲以及独联体国家则在没有坚实的法治基础上,过早的引入了民主的政治制度。例如,强制度框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越南“激进式”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强集权政体一直被保持着,在市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没有完全解体,凭借专制手段填补了法治缺失的真空,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样,激进式改革比较成功的中欧国家,其强民主政体以及新的市场制度出现的很快,从而也避免了很大的损失。而在差的法治环境中进行民主化,会进一步削弱制度的力量,并且会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变坏,对投资环境以及产出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并且也不利于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创造。

其次,制度能力的低下表现为制度坍塌所导致的制度真空。Campos(1999)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倒塌所带来的制度真空是经济改革成功或者失败的根源。制度真空主要由于旧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市场体系中的相关制度不能快速出现支持市场改革所造成的。多数改革者认为制度改革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优先关注的重点,进而导致制度改革滞后;同时还认为随着私有化改革完成后,市场制度会自发的完成(Turley和Luke,2011)。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没有相应的制度作为支撑,只是等待制度自发的演化,则会造成混乱、非组织化的局面,甚至在有的情

况下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骚乱(Djankov等,2003)。并且这也成为许多经济学者对于华盛顿共识中所谓的普遍性的、最好的政策却不能使得转型国家取得预期的经济绩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有的改革者认为,私有化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私有部门的解决方法常常伴随着威胁、恐吓或者一系列的暴力和对公有财产或者已经私有化的财产的大规模侵吞等行为(Hare,2012)。

第三,制度能力的低下表现为制度误用。制度误用是指制度使用的原因与预想的目标不相符。当一个制度被破坏性的运用时(Polterovich,2001),这一制度可能会变成机会主义者的私人收益(租金)的来源,然而此收益是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来换取的。此时的制度也就失去了最初的价值创造作用和能力,最终变成了一个重新分配的工具,并且经常导致总福利和效率的损失。对于上述制度,Acemoglu等(2002)划分为“私人财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前者是为公共利益所服务的,而后者是攫取租金的工具,此制度的存在明显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如果制度出现误用,则会使私人财产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并且还可能会变成攫取性的制度。

4. 社会资本及其产出

除了政策本身、市场制度、政府规制之外,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试图从社会资本角度来分析转型损失。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Arrow,1972;Knack和Keefer,1997;Algan和Cahuc,2010、2013)。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制度来进行的。然而,到目前为止,对社会资本所包括的研究对象却没有严格的、统一的标准,一般包括信任、习俗、社会规范、市民社会、价值观、态度、信仰,有时还包括文化和历史遗产。因此,本文从广义的社会成本出发,不局限于单一的研究对象,即在本质上把社会资本当成一种非正式制度来看待。对于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转型过程的损失,主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首先分析当转型过程中出现制度真空和制度误用时,社会资本(信任、社会规范、价值观等)如何影响制度;其次分析社会资本中的文化、历史是如何影响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移植。

传统制度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可以进行相互替代,尤其是在制度缺失或者真空的情况下。制度真空时,良好的社会资本可以部分弥补制度缺陷(Kranton,1996),进而提高社会资本的收益(Durlauf和Fafchamps,2005)。然而,当社会资本缺乏时,可能会使制度贬值或者扭曲加剧,即制度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和尊重。例如,先前存在的社会价值和商业惯例可能是避免新颁布法律被误用的重要因素。法律的有效性取决于在当时的情形下,法律是否有意义,是否由与现行的社会规范相一致,或者是否符合社会 and 私人部门的需求(Cooter,1997;Berkowitz等,2003)。如一致,则新法律可以起到作用,激励人们合理的运用,并且个人也愿意帮助国家共同维持和实施这一法律;反之,法律制度就会被误用。另外,较近的历史事件也会影响公众对制度的态度,如果一个制度在其初期不成功,或者很脆弱,那么公众对于此制度的支持就会减弱,而且将来的误用也将会继续,并且无法阻挡。研究表明,如果某一法律制度,由于历史上曾被权势集团(Pistor,1999)或者富人群体操纵而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任,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对这一制度的误用采取冷漠的态度,就像对待普通商业活动一样接受它。例如,在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的社会资本存量非常低(Mersijanov 和 Jakobson,2007),这与之前以暴虐政府形式为特点的政治和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现存的社会资本经常以一种反对现代制度的形式而存在,其目的是为了寻求来源于坏制度环境的保护,而不是去修复它(Rose,2000)。

不仅如此,社会资本中的文化、历史等因素也对制度移植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对转型国家来说,制度移植是不可避免的,但其质量低下通常会归因于文化的排斥和不适应(Cooter,1997;Rodrik,2000;Polterovich,2001;Berkowitz等,2003);或是现有制度与其余制度组合之间的不一致性(Roland,

2004);或是改革的不完善;或是多重制度均衡以及制度陷阱。

四、简要的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转型政策、制度转型两个方面出发,分析和比较了转型引发的福利损失的原因。结果表明,首先,转型具有长期性。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现有的研究表明,部分走在转型前列的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体制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但实际上,这些体制转型国家离所谓“正常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Havrylyshyn, 2013; Popov, 2012; Berglöf等, 2012)。其次,转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目前转型的经验来看,所谓的“一刀切”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因为转型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历史、宗教、文化传统以及其他社会资本存量等,均会影响转型的绩效,从而也就造成了转型国家政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各国的转型不能按照同一模式来进行,应该根据自身的制度特点,来实施合适的改革政策。第三,转型过程中的转型损失存在着必然性。根据现有的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哪类转型,都会造成一定的福利损失,只是由于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差异,损失程度或者典型事实稍有不同。第四,转型过程中损失的原因存在着较强的一致性。总体上来看,转型国家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支撑市场运行的基础制度存在着缺陷。第五,转型损失的研究,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制度领域倾斜。对损失原因的探究,尤其是国外学者,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对政策本身的争论,如改革的速度、顺序,转移到重点探讨制度如何影响转型绩效以及导致绩效差异这一层面上来。

除此之外,转型期转型损失原因的探索与分析对于经济转型理论与转型国家的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首先,作为最先启动转型、并且同时又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大国来说,在特殊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结构下,中国选择了与西方主流不一致的转型模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成果不仅大大丰富了转型国家的经验与理论,并且还可以为其他转型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其次,通过其他转型国家与中国转型绩效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转型之所以相对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型过程中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一党制领导下的强有力国家政权可以为政策的实施以及改革提供有力的保障),以及改革政策中所暗含的与传统文化、社会资本相一致的内在制度。这说明,转型模式、路径或者转型政策的多样性应该是转型经济学的应有之义,而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或者教条于一种模式或者一种路径,因此中国的转型和发展经验显然也应该成为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中国转型问题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因此,国内学者可立足于中国的典型事实或者案例,利用国外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中国转型中的难题,一方面可对经典理论进行验证,另一方面还可对经典理论进行延展或者补充,同时更有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转型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 and Robinson James A.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94.
2. Aghion, Philippe and Yann Algan and Pierre Cahuc and Andrei Shleifer. 2010. "Regulation and Distrus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3): 1015-49.
3. Algan, Yann and Pierre Cahuc. 2010. "Inherited Trust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5), 2060-92.
4. Algan, Yann and Pierre Cahuc. 2013. "Trust, Growth and Well-Being: New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ZA Discussion Paper.
5. Amsden, Alice Hoffenberg and Jacek Kochanowicz and Lance Taylor. 1994. *The Market Meets Its Match: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ies of Eastern Europ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Berend, Tibor Ivan. 2009. *From the Soviet Bloc to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ince 19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Berglöf, Erik and Lise Bruynooghe and Heike Harmgart and Peter Sanfey and Helena Schweiger. 2010. *European Transition at Twenty: Assessing Progress in Countries and Sectors*. Working paper/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8. Boycko, M and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1995. *Privatizing Russ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9. Calvo, Guillermo A and Fabrizio Coricelli. 1993. "Output Collapse in Eastern Europe: The Role of Credit." *Staff Paper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32–52.
10. Campos, Nauro F. 1999. "Context Is Everything: Measur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269).
11. Durlauf, S and M. Fafchamp. 2005. "Social Capital." in Aghion and Durlauf (ed.),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 1639 – 99.
12. EBRD. Transition Report 1999: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9.
13. Ellman, Michael. 2012. "What Did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tribute to Mainstream Economics." *VO-PROSY ECONOMIKI*, 8.
14. Hare, Paul and Turley, Gerard, ed. 2013. "Introduction to the Handbook".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38–64 , Routledge.
15. Hare (ed.) 1999. *Systemic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London: Macmillan.
16. Havrylyshyn, Oleh. 2013. "Is the Transition Over? A definition and some measurement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17. Kolodko, Grzegorz W and D Mario Nuti. 1999. "The Polish Alternative: Old Myths, Hard Facts and New Strategies in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sh Economy." *Hard Facts and New Strategies in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sh Economy*.
18. Kornai, Janos. 2000. "Ten Years after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The Author's Self-Evaluation,"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 Kotz, David M. 2000. "Lessons from Economic Transi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Rad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210.
20. Linn, Johannes F. 2001.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good news and the not-so-good news", in Mario I. Blejer and Marko ?kreb (eds), *Transition: The first decad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1. Marangos, John. 2013. "Theories and Model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93–311, in Hare and Truley (e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Routledge.
22. John Marangos, Alternative Politico-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2003, Vol. 8: Iss. 1, Article 4.
23. Popov, Vladimir. 2012. "The Long Road to Normality: Where Russia Now Stands" in Gerard Roland e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he long run view*, Palgrave Macmilan.
24. Popov, Vladimir. 2011. "Lessons from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Putting the Success Stories of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into a Broader Perspective." Available at SSRN 1764126.

〔责任编辑:天 则〕